



臺東縣大武鄉公所 114 年度
大武文化生態博物館共創計畫

大武！話大武事

山是記憶，海是路徑

人們的故事，在此匯聚成文化的河流





臺東縣大武鄉公所 114 年度
大武文化生態博物館共創計畫

大武！話大武事

山是記憶，海是路徑

人們的故事，在此匯聚成文化的河流

| 序 |

在山海交織的大武，這片土地從不只是地圖上的座標，而是無數生命交會的脈動。大武不是偏鄉，而是一座被山海養育、被故事推動的地方。作為本書主編，我有幸陪伴這段記錄旅程——從最初散落於村里間的零碎記憶，到如今匯聚成冊的《大武人話大武事》。

無論是山上的部落徑路、海岸線的潮間帶，還是老街的巷弄與廟埕，這些都是大武最真實的生活風景，也是族群與家庭記憶的載體。長期投入在地工作的經驗，讓我更加明白：保存地方記憶不是浪漫，而是迫切而必要的行動。

在與長者深談的每一個午後，我聽見了童年奔跑的足跡、潮間帶的鹹味、林班的汗水、旅社與山產店的繁華，以及語言混融背後的文化親緣。這些故事原本散置在日

常裡，不張揚、不華麗，卻構成了大武最扎實的文化基底。

大武老街如同一條記憶的河流：福安宮的廟埕、國小的鐘聲、廟口的談笑聲、遊覽車帶來的黃金年代、山產店的熱鬧市聲……所有故事都在這裡匯流。這條老街不只是人群往來的空間，更是大武在時代洪流中守護自我步伐、語言與風景的見證者。

這本書收錄「大武人」口述訪談，記錄的不僅是個人的生命軌跡，也是整個地方的百年記憶地圖，它們提醒我們：文化不是抽象，而是每天在生活裡被實踐、被傳承、被重新理解，感謝願意分享故事的每一位長者與青年，是你們的聲音讓大武從沉默中甦醒，願這本書不僅是回顧，更是邀請更多人走進大武、走進老街，並在這片土地上書寫屬於自己的下一章。



大武，一個被山海環抱的邊陲之境，從日治時期的鐵路中繼，到戰後的族群融合，再到今日的新返鄉浪潮，這裡的歷史從未是線性的敘述，而是層層疊疊的生活紋理。然而，比起宏大的地理敘事，我們更在意的是：大武的文化究竟是如何被生活書寫，而不是被歷史定義？

本書《大武人話大武事》以口述歷史為核心，重新打開這片土地的記憶之門。我們不追求冷峻的歷史框架，而是聚焦個人與集體的交織。大武的故事並不存於檔案，而存於人的記憶中；因此，我們以口述史作為方法，讓被忽略的聲音重新被聽見。

在超過三十篇訪談中，我們聽見遷徙的辛酸，如排灣族從山區下移的歷程；聽見產業的浮沉，從潮間帶採集、漁業興盛，到山產商行的起落；也聽見語言與信仰的混

融，在福安宮的廟埕裡，排灣語與漢語交織成日常的韻律。這些片段讓我們看見：大武的歷史不是單線前行，而是一座多族群、多視角、多語言交會的文化場域。

同時，青年返鄉的篇章亦展現新力量。他們透過社區行動、文化復振與創生計畫，讓老街重新被看見，使地方不僅承載過去，也成為正在生成的生命場域。本書以「山、海、街、人、願」五大軸線展開：山，是遷徙的路徑；海，是生活的節奏；街，是日常的舞台；人，是故事的核心；願，則是面向未來的想像。在快速變動的時代，大武人的故事提醒我們：記憶不是靜止的文物，而是活的資產。願這本書成為讀者重新理解大武的入口，也成為下一段大武故事得以持續書寫的起點。

主編 | 林昆緯

114年12月 寫於《大武人話大武事》



目錄

第1章 | 山的記憶：部落遷徙與獵人智慧

- 1-1 | 土地的根源，依靠山林生存 ————— P06
- 1-2 | 茅草屋與早年生活 ————— P08
- 1-3 | 古修修農場 × 山腰的童年 ————— P09

第2章 | 海的記憶：潮間帶、漁撈與海岸的人生

- 2-1 | 潮間帶 × 海邊童年 ————— P12
- 2-2 | 圍網、拖漁排、搶灘生活 ————— P13
- 2-3 | 麵包車 × 海岸線的日常 ————— P14
- 2-4 | 多族群捕魚文化 × 海邊記憶地圖 ————— P15
- 2-5 | 海岸線的風災記憶與重建 ————— P17

第3章 | 街的記憶：大武老街 × 廟口生活

- 3-1 | 福安宮 × 老街的核心記憶 ————— P20
- 3-2 | 大武國小 × 廟口 × 街仔人的童年 ————— P22
- 3-3 | 印鑑師傅 × 雜貨店 × 撞球館 ————— P24
- 3-4 | 遊覽車 × 山產店 × 老街黃金年代 節摘 ————— P25

第4章 | 人的記憶：家庭、語言與生活的重心

- 4-1 | 家庭 × 勞作 × 經濟 ————— P28
- 4-2 | 移入 × 返鄉 ————— P29
- 4-3 | 歸屬不是回來-而是一直都在 ————— P30

第5章 | 願的未來：返鄉、教育與未來想像

- 5-1 | 地方歷史知識承接：大武記憶的傳遞 ————— P32
- 5-2 | 教育 × 在地 × 未來的可能 ————— P33

特別篇 | 海上的遷徙：大陳人 × 大武

- 大陳人 × 大武：海上的遷徙與落腳 ————— P36

第1章 | 山的記憶

部落遷徙與獵人智慧

探討人與土地的根源，以及依靠山林生存的集體記憶。
山，是生活；部落，是根。從古修修到和平，再到大烏，這一帶的山腰承載著族群遷徙的道路，也塑造了大武最深的文化底色。



1-1 | 土地的根源，依靠山林生存

和平部落 (Kushushu) 最早的住民，大多循著山路而來。他們從大鳥 (Pacavalj)、新化 (Kubalin) 山谷小徑一路搬遷而下，尋找能開墾、能居住的坡地。這段遷徙並非一時的決定，而是世代反覆衡量山林、耕地和家族需求後，逐步形成的生活路徑。早年物資匱乏，家戶全靠肩挑手抬、步行往返山與平地。部分耆老記得，那是「走一天才能換一把鹽」的年代。

在口述中，陳慶榮與多位耆老都提到：山不是背景，而是生活本身。山給予木材、狩獵、飲水，也決定了部落聚落的位置與遷移方向。族人從山林獲得生命必需也構成和平部落 (Kushushu) 最深的文化根源。

從一條不成路的山徑開始。許多耆老說，那不是被「開」出來，而是被「走」出來的。陳慶榮回憶，他的父親與更早的家族，是從山腰先落腳，再慢慢往下走；那不是遷村命令，而是生活自然發生的方向。

早期的物資得靠步行到大武街上換取。耆老形容：「挑著番薯、豆子，一走就是

半天。」那是「路比貨重」的年代。女人背柴、男人扛木，孩子在早年未開墾的山坡奔跑，習慣用腳掌感受石頭、泥土的形狀。山林給予他們生活必需：樹幹是柱、樹皮能補縫、獵物是蛋白質來源，陳慶榮說，以前打獵不是為了運動，也沒有多餘獵具，而是為了家裡能再多一餐肉。



1-3 | 古修修農場 × 山腰的童年

古修修農場(Kushushu)是族人記憶中的重要地名，位於山腰的位置，介於舊部落路徑與大鳥(Pacavalj)方向之間，是族人在遷徙過程中短暫停留、耕作、建立家屋的中繼點。多位耆老回憶，那裡會有梯田、旱田與小片果園，是早年族人最先開墾的區域之一。山腰的生活雖艱困，但也孕育了童年的自由與學習：孩子們在梯間奔跑、協助家務，懂得辨識山豬足跡、採可食野菜，並在家長工作時負責顧弟妹。古修修農場也象徵著遷徙的過渡——從山上往平地的第一步，每戶的家屋都在這裡停留、調整，再決定要往哪裡生活。族人在山腰度過的生活細節與遷徙的集體情感。

古修修農場(Kushushu)在族人的口述中，是「走下來之前的第一個家」。許多年長者提到，部落從更高山處往下遷徙時，並不是一次到位，而是先在山腰找到能耕作的土地，再慢慢形成家屋聚落。山腰地勢較平坦、水源穩定，周圍又有可利用的林木，因此在遷徙史上成為自然的停靠點。

山腰生活雖然艱苦，卻是許多人童年的主要舞台。林秀英、劉貴雀等女性回憶，那時的孩子很早就要幫忙家務：洗野菜、搬柴火、顧弟妹、趕山豬，許多同齡孩子都擁有高度的山林技巧。女生懂得辨識哪些野菜可食、哪些有毒；男生則跟著長輩上山學習陷阱、追鹿、找蜂巢。孩子很少真正休息，但也很少抱怨——山就是他們的遊樂場。





圖 | 訪談陳慶榮先生

陳慶榮說，他的父親和叔伯們最早就在古修修農場搭起茅草屋，男人負責砍樹、立柱、編牆，女人則整理土地、種番薯與小米。那時沒有鋤頭、鋼釘等工具，大多使用削尖的木棍與石片處理耕地。耆老形容：「那不是農場，是生存場。」但在記憶裡，它仍然帶有溫暖與踏實。

古修修農場周邊多梯田，是族人最重要的耕作地。耆老說：「那時候沒有肥料，全靠人力。」每年翻土、收成，都需要整個家族協力完成。孩子們常在田埂上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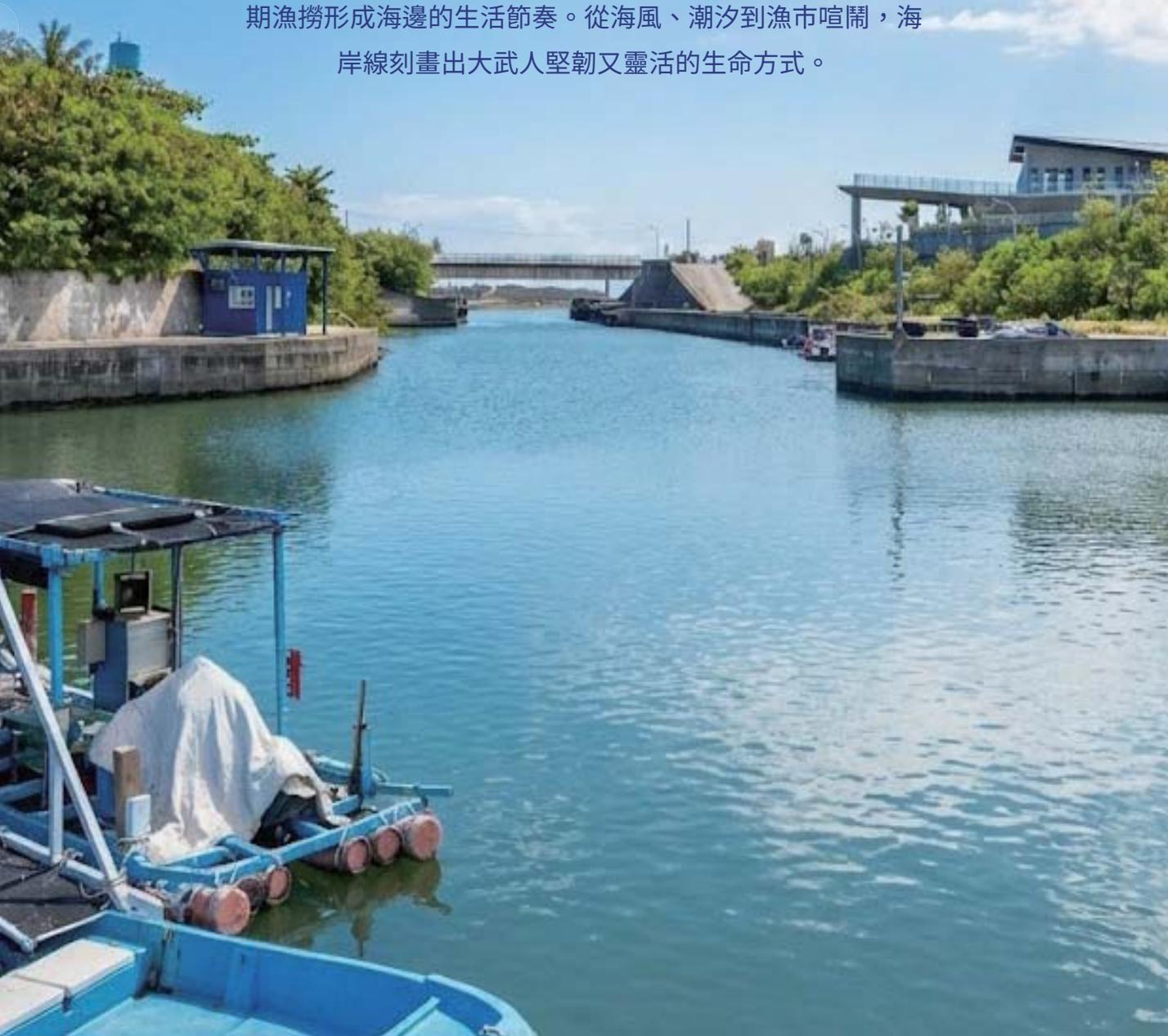
逐，踩著濕土滑來滑去，有些人跌進田裡，滿身泥巴被大人罵；但下一刻又跑出去玩。童年的自由，就是在勞作之間縫隙中長出的。

隨著道路開通、人口漸往平地移動，古修修農場逐漸縮小，成為記憶中的地名。但每位耆老談到童年，都會回到那片山腰：有第一間家屋、有最早的耕地、有族人剛落腳時的努力，也有最純粹的童年。古修修農場因此不只是地點，更是和平部落(Kushushu)從山林走向村落的轉折點。

第2章 | 海的記憶

潮間帶、漁撈與海岸的人生

海，是大武家庭最穩定的依靠。潮間帶採集、搶灘上岸與早期漁撈形成海邊的生活節奏。從海風、潮汐到漁市喧鬧，海岸線刻畫出大武人堅韌又靈活的生命方式。



2-1 | 潮間帶 × 海邊童年

大武的海，是大多數耆老童年與生活的起點。潮間帶提供了食物可交易的海產，也是許多家庭得以度過困難年代的重要來源。「退潮，就是孩子下工的時間。」多位口述者都有類似回憶：全家在潮間帶採海菜、撿螺、抓螃蟹，甚至挖沙蟲、採藤壺；農閒或上課後便下海補充家中食物。海邊不是遊憩場，而是生活補給站。季節、潮汐、風向都會影響採集量，而孩子從很小就學會「看潮」、「看浪」。海邊採集如何支撐家庭、養育孩子，也如何形塑大武人面海而生的生命節奏。

劉貴雀說，她的童年是在海邊與大人們的提醒中長大的。大武的孩子與海靠得很近，只要潮水退下，男孩便會成群結隊往海底跑，最常做的，就是抓魚苗。那時候沒有玩具，也沒有多餘的娛樂，抓魚苗便成了孩子間最自然的遊戲。她笑著說：「我們從小就是在海裡摸，海底看魚在跑，我們就去抓。」這種看似玩耍的動作，實際上也成了補充家裡食物的一種方式。

大武的孩子幾乎都會游泳，但那不是被教會的，而是「被海逼出來的」。常常是玩著玩著，就被海浪拍進去，久而久之，孩子自然懂得如何浮起、如何往岸邊游。這種粗糙但真實的學習方式也讓孩子更早懂

得敬畏海，明白哪些地方能下去、哪些地方不能靠近。

她也談到早年的漁港形態。那時沒有現在的碼頭，全靠竹排搶灘。漁船回來時，岸上的人必須抓準浪勢，把船往岸上拉，一旦判錯浪頭，整艘船就可能被打翻。她從小看著大人們與海搏鬥，也學會分辨浪的方向、風的變化。即使她未曾下船作業，但那些景象深深烙在她的成長裡。

劉貴雀的海邊童年，不是浪漫的海灘回憶，而是一種介於生存與危險之間的日常。海給予食物，也奪走力量；教孩子成長，也逼孩子懂事。她說：「我們就是在這些裡面長大的。」這句話留下的餘韻，是大武人與海共存的真實生命圖像。



2-2 | 圍網、拖漁排、搶灘生活

大武海岸的漁撈文化，以「人力 × 集體」為核心。圍網、拖漁排與搶灘，是在沒有大型漁具與引擎船之前，沿岸最主要的捕魚方式。耆老們回憶，清晨出海佈網、午後搶灘拖網，人人分工——有人看浪、有人握繩、有人整漁排。漁獲上岸後按「勞動、年紀、貢獻」分配，是一種兼具公平與互助的生活制度。這些技術依賴對海流、潮水、季風的深度理解，也展現大武人與海洋共存的智慧。

劉明木說，大武早年的捕魚沒有港口，漁民出海全靠竹排。「那時候都是用搶灘的，用扛的。」每次要出海，大家先把竹排從沙灘推到浪邊，等浪勢稍弱時，用力往前頂，一個浪打上來又得穩住身體。他形容那是一種「跟海搶時間」的工作，排要推得準、浪要看得懂，不然大人與竹排都可能被打回岸上。捕完魚回程也一樣，竹排要靠人扛上岸，沒有機具，全靠臂力與默契。

董炎輝的記憶則補上海上的另一個場景——圍網。「兩台漁排一定要一起去，用海底去圍。」他說，捕魚不是把網撒下去就好，而是要兩台排從兩側慢慢逼近，靠眼光判斷魚群方向，再用力收攏。他用手比著那種「半圓靠攏」的姿勢，說那是靠多年累積的經驗：海色不同、浪的速度不同，魚群的反應也不同。一次合攏的動作要兩台排同時拉緊，否則魚就會衝散。這些技術沒有學校教，全靠跟著大人看、做、摸索。

下午的「搶灘」則是最熱鬧的時刻。兩管粗繩從海裡拉回岸上，大家分左右兩排站定，隨著號子聲合力往後拉。海水從腳邊

湧上來，濺起的白泡混著汗水。幾十人拉著同一張網，若今天漁獲豐盛，岸邊會響起歡呼聲；若成果不佳，也是一樣均分。

大武的捕魚文化在眼前清晰成形：有人在海上圍網，有人在岸上拖排，有人搶著把竹排頂進浪裡，有人接力把排扛回來。這不是機械化的漁業，而是完全依賴肉體、眼力與彼此合作的年代。海是生計，也是挑戰；每一次上與下的動作，都像是在與浪搏命。從劉明木、董炎輝到黃月葉，他們的敘述共同記錄了一個大武人靠海吃飯、靠彼此

活下來的年代。搶灘生活也有分工。女人與孩子負責撿漏網的

小魚、挑回家清理；男人拉網、判斷潮水、處理漁具。漁貨

不多的時候，就按勞力與家中人口分配；漁貨豐

收時，整條街都能聞到魚的鮮味。



2-3 | 麵包車 × 海岸線的日常

林士中與大武一帶的道路發展密切相關。他自23歲起開著麵包車沿著知本到大武的路線販售麵包，後來也固定跑山區部落，如土坂、台坂、愛國埔等地。早期部落缺乏店家，小孩常在放學後沒有吃的，他便會在能力範圍內提供麵包。多年來，他隨著南迴鐵路開通、工作機會外移，親眼看到大武人口減少、商業衰退。過去他以麵包車為主要生計方式，也因此長期觀察地方變化，希望大武的未來能找回昔日街區的活力，讓年輕人有留下來的可能。

起初在知本的麵包店學習製作麵包，後因當地店家眾多，與太太討論後決定改以流動方式販售。受到她在台中看到麵包車到工廠叫賣的經驗啟發，他們開始試著沿著知本到大武之間的路線經營。那時的南迴道路兩側仍有許多軍隊據點，海防哨林立，沿路常可見到阿兵哥。他每天在各營區之間穿梭，獲得長官許可入內販售麵包，形成最初的客層。

早年的大武仍是南下交通的重要停靠點。南迴鐵路尚未開通時，人車往返屏東與台東都必須經過大武，公路局在當地設有固定停靠站，餐飲與商家密集，使得街區十分熱鬧。林士中第一次抵達

大武時便感受到它的繁榮。雖然一家先在大溪買下房子暫住，但他仍每天沿著海岸線跑生意，也因此逐漸了解沿線聚落的生活需求。

他看著大武各村落的人口漸漸外移、在地的的工作機會減少、年輕人逐漸離開，只剩下年長的居民留在村裡。以前大武街幾乎沒有空屋，如今多數為閒置或老屋；他對比當年的人潮與如今的寂靜，感觸深刻。

從第一年跑到如今近三十年，他親眼見證大武的起落，他盼望未來的大武能重新找回一些生機，不必完全恢復從前的繁榮，但至少讓下一代有留下來的理由。



圖 | 訪談林士中先生

2-4 | 多族群捕魚文化 × 海邊記憶地圖

大武的海邊，從來不是單一族群的領域，而是一張多族群共同生活的社會地圖。王璽盛回憶，南興村之所以特別，在於海岸線廣、出海方便，使得外省人、閩南人、客家與排灣族在此匯聚，各自帶著不同的捕魚方式與生活習慣。早年沒有漁港，捕魚靠竹排、靠推、靠搶灘，需要整個村落的人力協助；婦女拖排、男人出海、孩子在岸邊幫忙，是共同的生活節奏。捕魚技術、語言、信仰、勞動方式在海邊交錯，使這裡成為多族群互動最密集的場域。海既是生計來源，也是文化融合之地，讓大武的海邊成為一幅立體的社會生活地圖。



在大武的海邊，捕魚並不是單純的漁業行為，而是一個族群混居、技術互補與生活交錯的日常。王璽盛說，南興村之所以形成現在的樣子，是因為「這邊靠海，有一大片沙灘，大家就聚在這裡」。外省人、閩南人、客家與排灣族都在這裡生活，但彼此的生活方式與捕魚技術不盡相同，於是海邊就成為他口中的「多族群交會點」。他記得，外省與漢人多半靠海討生活，排灣族則較多在山上工作，偶爾會加入捕魚行列，形成一種自然的分工。

缺乏港口的年代，海邊是村落合作的舞台。黃月葉記得，她母親那一代，「抓魚

回來要大家一起拖」，竹排靠岸時，一個人不可能把排拉上沙灘，必須整個村子的人一起幫忙。男人、女人、小孩都會到海邊協力，一口氣把沉重的排從浪頭拉回岸上。幫忙的人會分到一些魚，這種「分魚」文化讓海邊不只是捕魚者的空間，而是整個村落共享的生活場域。她說，拖排的場面常常很熱鬧，大家的力氣、笑聲、濕透的褲腳，都是那時候最日常的風景。

海邊的危險，也是這張社會地圖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張來正說，以前沒有港口，「我們在沙灘那邊推船，浪大起來，是跟命搏的」。他看著漁夫從浪裡衝出來，有

時船翻了，大家得跑去救；有時浪頭太急，整艘船直接被吞掉。他形容那是一種「每天都在賭天氣」的生活，沒有真正安全的時候。這些危險不分族群，每個靠海生活的人都在相同的風險下做工。

捕魚也形塑了海邊的經濟節奏。劉明木說，虱目魚苗季到了，就會有人整理竹排、推排出海；季節過了，就得去外面打工補貼生活。捕魚不是全年穩定的工作，而是跟海象、季節、餐廳需求、村落消費一起變動。海邊生計因此呈現一種彈性與流動性：人、技術與收入，都在浪之間起伏。

當這些口述回憶交錯在一起，大武的海邊呈現出一張立體的記憶地圖：有人靠海捕魚、有人在岸邊拖排、有人在沙灘推船、有人依季節轉換工作；有些人說台語，有些人講排灣語，也有人帶來外省語言與信仰。捕魚技術、族群差異、語言、信仰與危險，交織成海邊共同的生活節奏。海，是大武最複雜、也最具包容性的生活邊界。



2-5 | 海岸線的風災記憶與重建

大武位在「山海交會、地形狹長」的特殊位置，颱風一來，大浪沖擊道路、岸線後退、道路坍方是常見景象。耆老們記得，早年沒有護岸石與防波牆，海浪能一夜之間吞掉大片沙灘，甚至逼近民宅。這些風災記憶也刻畫出海岸線的變遷：沙灘消失、海蝕更深、道路多次改線。重建不只是修補，更是一場關於土地、自然與人之間的長期協商。

在大武，風災不是偶發事件，而是一種「生命節奏」。耆老們說，大武每年都像在等上一場考驗。颱風從太平洋接近時，海面顏色會先變暗，空氣變濕，海風帶有鹹度的厚重味道。浪打到岸邊時，聲音低而沉，像是在警告。

早年沒有護岸工程，大武的海岸線始終裸露在海浪威力下，格外脆弱。每逢颱風來襲，海面掀起數米高的大浪，猛烈拍打岸邊，不只噴上道路，甚至能將整片沙灘一夜吞沒。許多耆老回憶，那種震撼是「昨天還能走的地方，今天整個被海吃掉」。海浪不斷侵蝕，使大武的道路幾度被迫後退、改線，一次次往山腳縮移。沿海地勢因此呈現罕見的「靠山壓海」景象，道路緊貼山壁，而海就在不遠處翻湧。這些持續的侵蝕與重建痕跡，成了大武人共同的記憶，也形塑了今日獨特的海岸風貌。



颱風過後，海邊滿是被打碎的漂流木、石頭與破網。重建通常沒有明確分工，而是自然而然展開：男人搬石、老人巡視、婦女準備食物、孩子負責遞工具。這種集體性的行動，是大武長年面對大自然的方

式。海岸線的變遷也深刻影響漁民生活。某些原本可搶灘的區域因侵蝕而無法靠岸；原本平緩的沙灘變成陡峭的海蝕地

形；海邊的植物也因鹽害改變生態。耆老們常感嘆：「海不一樣了。」但他們也明白，海的改變是自然與時間的結果。

重建海岸的過程，不只是修一道牆，而是在與自然長期對話。大武人學會：「海再退一步，人就再向前一步。」這種面對海的韌性，也是大武文化最鮮明的底色。



第3章 | 街的記憶

大武老街 × 廟口生活

老街是大武最熱鬧的文化舞台。遊覽車、人潮、山產店與廟埕活動交織出屬於大武的黃金年代。廟口、國小與店家串起日常，也是跨世代共同的生活記憶。



3-1 | 福安宮 × 老街的核心記憶

福安宮位於大武老街核心，是街區的精神坐標，也是所有人「來大武必經之地」。在早期的老街生活中，廟口前的廣場是孩童遊戲、老人乘涼、商家擺攤、外地旅客歇腳的共同場域。董炎輝的記憶裡，福安宮並非只是一座宗教建築，而是村落的資訊中心——公告、請願、比賽、集會全部在此進行。宮前的風景隨時代變動：曾因木屐店、柑仔店、麵攤、炸物攤而熱鬧，也曾因人口外移與交通改線而沉寂。福安宮見證了大武街的興衰，也凝聚了地方的情感與集體記憶。「現在福安宮就沒什麼人在出入了，春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時才會有人回來。」

大武老街，在地人習慣直接叫作「廟口」，因為整條街的中心，就是供奉百年神尊李王的福安宮（大武福安宮）。老街過去是漢人聚居最密集的地方，店鋪、香舖、雜貨、冰店、牲禮行沿著街道排列，日常的聲音與氣味都從廟口開始蔓延。

李玫倉 在口述中多次提到李王是「看著這條街長大的」，福安宮不只是信仰中心，更是地方秩序、凝聚與情感的起點。每逢農曆重要節日或祭典，街上會擺滿供桌，孩子在附近奔跑，老人家在廟埕聊天，宮口像是一個沒有門檻的公共場域。李玫倉回憶，只要廟裡的「八音」經由擴音喇叭放送出來時，老街的人就知道「該集合了」。這種訊號式的生活節奏，深刻影響整個橋南聚落。老街的商業與廟宇生活更是緊密扣在一起。

吳阿雲的金吉成香舖就位於老街上，她說，廟口的生意有一半靠信仰節奏支撐：初一十五、神明生日、清明、中元、過年，只要廟裡開始動，整條老街就會亮起來。香舖會忙到手軟，紙料、爆竹、香枝整袋整袋搬出去，街坊鄰居也會順道串門子。



她說：「廟口不是商業區，它是生活區。」福安宮的存在讓店家之間形成某種不言說的秩序——互相照應、互相支援，誰家有事，整條街都會知道。老街的興衰也在口述中清晰可見。董炎輝回憶，他年輕時常往返楓港與大武，廟口永遠最熱鬧。街上的肉攤、雜貨店、理髮廳、飲食店接連不斷，尤其傍晚時刻，從外地工作回來的人會在廟口聊天、抽菸、交換消息，整條街

像不會冷卻一樣。

隨著人口外流、南迴公路改線、商業重心轉往台9線大道，老街變得安靜。攤販不再聚集，夜裡只剩路燈照著廟口。但董炎輝說，福安宮承載的不是熱鬧，而是長期以來大武人的「生活秩序」與共同情感。如今的老街再度因文化導覽、社區活動而慢慢亮起，福安宮依然是起點，也是支點。



3-2 | 大武國小×廟口×街仔人的童年

大武國小與廟口，是許多街區孩子成長的兩個中心點。孩子們清晨從老街走到學校，午後回到廟埕、香舖、小雜貨店，形成「學校—廟口—家門口」的日常循環。陳志明描述那時候的街區人情濃厚，小孩走到哪都有人喊名字；街仔人不靠約定，只靠生活節奏就能遇見彼此。李玫倉的廟口記憶更讓老街空間成為一種共育的場域。包含 王秀春、林春桃、徐慶東 等人都說，童年的自由與安全感，都在廟口與大武國小的距離之間形成。

在大武，孩子的生活有兩個固定的座標：一是大武國小，一是廟口。趙世崇記得，他從家裡走到學校的那條路，其實就是老街的延伸。早上大人開店、整理貨架，孩子揹著書包穿過香舖、雜貨店、米店，福安宮的香煙味混著炒菜香、海風吹來的鹹味，這些氣味組成街仔人童年的背景音。大武國小的下課鐘一響，他和同學會立刻往廟口跑，福安宮的空地就是天然的操場。

陳志明描述自己是「在街上被很多大人一起養大的」。放學後他會到廟口找朋友、

找表姊表兄、找同學，有時會被大人塞幾顆糖果，有時被叫去幫忙搬東西。大武老街雖然是漢人聚居比較密集的地帶，但孩子們的生活邊界並不分族群。陳志明說：「不會有人問你從哪裡來，來玩就是我們的人。」對他來說，大武國小是學習的地方，而廟口則是生活的地方。

回憶起小時候，每天都往福安宮跑，因為每天都有不同家庭的孩子在廟埕玩，從白天到黃昏。只要晚餐時間到了，家家戶戶的喊聲就會從巷子口響起，一個名字接一個名字地往廟口傳。





徐慶東的童年雖橫跨更大的大武地區，但他同樣提到：廟口是街仔人的第二教室。放學後的語言、玩耍、模仿、觀察，都在廟口完成。他說：「大武國小教課本，廟口教做人。」這句話將大武童年的兩個中心點串得更緊密。綜合眾多口述，大武國小與廟口之間的區域，就是街仔人童年的全部版圖。它沒有華麗建築，也沒有大型遊樂場，但卻讓一

的孩子擁有自由、陪伴、人情以及安全感——那是一種「走到哪都有人認得你」的童年，這種共享式的照應，讓孩子們在老街長出最自然的社交感與社區感。

隨著大武國小遷校、新街區形成、交通量增加，老街的童年風景逐漸退場。然而在受訪者心中，那段廟口與老街交織的時光，仍舊是最純粹的大武記憶。

3-3 | 印鑑師傅 × 雜貨店 × 撞球館

蘇振山六歲時隨父來到大武，父親靠刻印章維生，從此在老街長大。早期大武少數專業「篆刻師傅」；那時候大武上只靠他們一家店供應公家機關、林班工人、做生意的人辦理領薪、開戶、簽約所需的印章。騎樓前擺一張桌工作。阮茂榮回憶，那張小桌就擺在他們家門前，林班工人許多人不識字，要領薪需要簽名，後來得知「蓋印章也可以」，便紛紛上門刻印，印鑑需求一下被打開。隨著公路局停駛、機器刻印盛行，手工印章慢慢退場，球館也隨人潮消散，但兩家的記憶共同刻下老街最興旺的一段時光。

蘇振村說，他來到大武時才六歲，「跟著我父親來大武」，人生就此與老街綁在一起。父親是一位刻印章的師傅，在沒有影印店、沒有電腦刻印的年代，一支刻刀、一塊印石，就是一戶人家的飯碗。初到大武時，家裡沒有自己的店面，只能在街邊騎樓擺一張桌子，一盞燈照著四角木框夾緊的印石，那便是每日的工作場景。

那時的大武只有他們家會刻印章。林班工人、公路局職員、做生意的人要簽文件、開戶、領薪，全靠印鑑。每到月底發薪時，店門口總是排滿人，甚至有人現場等著刻章。父親也收山產維生，穿山甲、白面貂、狐狸、蛇，成了家計的一部分。叔叔在台南學藝多年，退伍後回來幫忙，也是他真正的啟蒙老師。「我父親不太教我，都是叔叔教的。」他笑著說。

後來，他們在老街買下一間房子，開雜貨店，日用品、零食、飲料一應俱全，刻印章仍舊在旁邊持續。許芷禎嫁過來後便專心顧店，縫衣補衣的工作則由婆婆在後頭操持。白天，刻刀的喀答聲、

針線的拉動聲、顧客買東西的腳步聲交織成老街最踏實的生活節奏。

同在大武街上，阮家的撞球館則把夜晚的熱鬧補得更滿。大武早年娛樂不多，抓魚苗的、做「寮仔山」的、開大卡車的工人一下工就往球館聚。原本只是家中新蓋房子的一樓空間，因姨丈一句「這裡有跨度，可以開球館，我來顧」而踏入這門生意。從清早亮到半夜十二點，冬天外頭冷，等夜車的工人常常拜託「先不要關啦」，阮家心軟，營業時間便一路延到凌晨一、兩點。球館裡有日本四顆球與「斯漏普」球台，球聲敲擊、讓級制度的點數計算、輸的人付錢的規矩，構成少年阮茂榮的成長風景。他練成一身好球技，自稱在大武打四顆球是「一流的國手」，與同輩的阿義常常是最強組合。

那些刻印章的日子，不只是謀生工具，而是大武老街最熱鬧的一段歲月：林班工人、山上的人、往來的旅客、公路局職員，全都走進他們家的店門口，在一顆小小的印章上，蓋下和大武連結的一個紅色印記。

3-4 | 遊覽車×山產店×老街黃金年代 節摘

趙世崇的口述，是大武街「最熱鬧的一段歷史」。民國 58 年後，遊覽車時代興起，大武街區靠著地利之便，成為南來北往的固定停靠點。每天五、六十台遊覽車湧入，十一間、十間等山產店一字排開，香菇、金針、木耳、農產乾貨成為最熱銷的商品。街道兩側擠滿旅客、攤販、叫賣聲。山產店最旺時，一天營業額動輒數萬甚至十萬。「日進萬金」不是誇飾，而是當年的真實景象。這段商業盛況也為之後的大武街變遷埋下伏筆。

趙世崇 18 歲時隨父親從溪底來到大武，租住在沒有浴室、沒有廁所、沒有電、只有一張床的草屋。生活雖然清苦，但他說：「大武土黏黏的，會把人黏住。」而真正讓他留下的，是之後的大武街所迎來的黃金年代。

民國 58 年前後，大武人口高達 1.2~1.7 萬，是南迴沿線最熱鬧的鄉鎮之一。公路局車輛停靠、山產交易、旅客往返，使得老街熱度不輸都市。尤其是「十一間」、

「十間」等商家聚集區，成為遊覽車固定停靠點。每天五、六十台遊覽車停在街口，旅客下車後立刻湧入山產店，搶購香菇、木耳、金針、海鮮乾貨等伴手禮。趙世崇說：「那時候生意好到像在搶。」

他與三位兄弟曾同時經營四間山產店。旺季時，一間小店單日營業額就可達數萬元甚至十萬。旅客一上車、下一班車又到了，整條街像無縫接軌的生意流水線。



圖 | 訪談趙世崇先生



老街的熱鬧帶來另一種競爭，趙世崇看準遊覽車需求，帶著兄弟到南興、圓山休息站開了新的據點，成功吸收部分遊覽車流量。他笑稱：「我算是罪魁禍首啦，遊覽車被我拉走，老街才會慢慢冷清。」這是一段反映商業策略與地方轉折的口述，以第一人稱見證老街盛衰。

遊覽車時代逐漸落幕後，大武人口由一萬多人掉到五千多。店家陸續收攤，街道變得安靜。趙世崇常感慨：「以前這裡是台東最熱鬧的街，現在變養老院。」但他也看到未來：「古街還是有機會。古街有人走，就還有希望。」

趙世崇的故事，是老街的全盛與轉折，是一段關於「人潮如何改變街道、街道如何承載時代」的真實記錄。

第4章 | 人的記憶

家庭、語言與生活的重心

大武的故事來自每一個家庭。客、閩、排灣族的語言交融，構成獨特的文化風景。從家務、勞作到世代遷徙，人們的生活選擇成為大武最真實的文化表情。



4-1 | 家庭 × 勞作 × 經濟

在大武，家庭與勞作交織成同一條生命線。王秀春她記得家裡大人忙於做工，孩子要顧弟妹、跑腿、幫忙，生活雖不富裕，但街坊之間互助緊密，人人都像一家。她說：「以前的人哪有休息，就是做。」而高吳春味的記憶則深植在香茅田裡。早年整個部落仰賴香茅維生，割香茅、挑香茅、蒸餾香茅油，一家子一起勞作。她回憶：「那時候只有香茅可以賣。」孩子從小得幫忙搬草、煮水、顧火，日子雖苦，但一家人靠著勞作慢慢把生活撐起來。兩人的口述共同勾勒出大武家庭的核心：勞作不是負擔，而是維持家計、連結家人的方式；家不是避風港，而是眾人一起做工、一起生活的日常場景。

在大武，家庭與勞作幾乎沒有分界，只要日子要過，全家就得一起動起來。王秀春的童年是在老街的房舍與巷弄裡長大，她記得那時家裡並不富裕，大人做工、女人顧家，而孩子能幫什麼、就做什麼。她說：「以前的人哪有休息，就是做。」簡單一句話，道出當時的生活節奏。鄰里間互動緊密，有菜會分、遇事就喊，哪家孩子在外玩太晚，鄰居都會先提醒再送回去。家務也是家庭經濟的一部分——顧弟妹、洗衣、跑腿、搬東西，都是孩子的日常。王秀春語氣裡沒有抱怨，只是自然描述那個年代每個家庭都習以為常的生活：不富裕，但務實、踏實，靠著彼此的勞作慢慢把日子維持下去。

高吳春味的成長場景則在山腰，家裡的經濟全靠香茅維生。她回憶：「那時候只有香茅可以賣。」香茅田沿著山坡展開，是全家的工作場。割、挑、搬運、蒸油，每一道程序都需要人力；大人背著沉重的香茅束，孩子則負責撿枝葉、搬柴火。她對蒸香茅油的畫面記得最深：大鍋下方火光跳動，大人攪拌、壓榨，孩子在旁添柴、顧火，空氣裡瀰漫刺鼻卻熟悉的香茅味。對她而言，那不是辛苦，而是「一家人一起生活」的氣味。兩人的記憶雖來自不同場景，卻都指向同一核心：家庭靠勞作串起，日子是靠大家一起做工、一起撐過來的。

無論是在老街的家務分工，或山腰香茅田的共同勞作，兩段生命線指向同一種大武精神——家庭不是由某一個人撐起，而是靠全家人一起做、一起過。勞作讓家維持，家人讓日子不至於倒下。王秀春與高吳春味的回憶，正是這代大武人最質樸、也最堅韌的生活底色。



圖 | 訪談 王秀春、高吳春味女士

4-2 | 移入 × 返鄉

在大武，移入、返鄉、選擇從來不是浪漫的口號，而是跨越世代的現實抉擇。高德昆在從事軍職二十多年，最後因為孩子與家庭選擇回到魯加卡斯部落。選擇成了他對家庭的承擔，也對部落未來的一種責任。彭建銘則是「移入來到大武」他從外地人的角度投入地方工作。陳志明返鄉大武，見證道路、人潮、產業的變化，他的生活軸線並非「離開再回來」，而是「一直在這裡」。三人的口述交織出一個共同核心：人生的選擇最終都繞回「家」，而返鄉，是對未來的再一次賭注。

彭建銘不是返鄉者，而是「移入大武」的青年。他以外地人的視角重新凝視這個地方。童年的記憶裡，大武是旅途中的必經休息站——車輛停靠、人潮補給、旅客在此吃飯歇腳，整個空間都充滿流動的節奏。多年後因創業而真正住進大武，他才第一次從「停留者」變成「生活者」。也因此，他開始重新思考大武的可能性；從與在地農民合作段木香菇，到嘗試澳洲茶樹等作物，他努力在地方與產業之間找出新的連結。對他而言，選擇來大武並不是因為外地受挫，而是因為「相信大武還有可以努力的地方」。移入大武讓他看見地方沉寂背後的潛力，也讓他願意用外地人的經驗，重新陪伴地方尋找下一步。

陳志明的軸線與一般返鄉青年不同，因為在他心裡，從未離開過大武。他親眼看著老街一年年變得安靜：店鋪關門、道路改線、往日的熱鬧逐漸退去，人口也越來越少。大武變得鬆動，但也因此讓他更敏銳地察覺那些正在悄悄發生的變化。他看到新一代回到地方，重新投入公共事務、社區活動；這些行動雖然不喧嘩，卻讓他感到地方仍在緩慢呼吸。他的視角不是「返鄉」，而是「留下來，慢慢翻動」。

無論是移入或返鄉，留在大武，這些生命經驗本質上都指向同一種力量——對地方的牽掛，以及對未來的想像。彭建銘以外地人的眼睛，重新看見大武的潛力；陳志明以留守者的姿態，守著地方緩慢變化的呼吸。家不是單一方向的路，而是每個人依自身境遇做出的選擇。大武的未來，也正是在這些選擇與返身之間，一點一點被重新編織出新的可能。



圖 | 訪談 彭建銘、陳志明

4-3 | 歸屬不是回來-而是一直都在

對高德昆而言，「離開」從來不是切斷，而是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去；而「回來」也不是重新開始，而是生命原本就會回到的位置。他在外軍旅生活二十多年，但始終認為南興部落(Qudjaqas魯卡加斯部落)才是心安的所在。節慶與族人聚會時，他的腳步總會自然回到家鄉。他說，旅外不是因為心不在，而是因為部落沒有足夠的機會。真正的歸屬不是返鄉那一刻，而是在外地生活的每一天，仍然記得自己要回去。對他來說，大武不是他「選擇回來」的地方，而是從未離開的牽掛。

在高德昆的生命敘事裡，「離開」從來不是斷裂。他說得直接：「我們這個年齡層沒有老街的記憶，生活本來就在部落。」對他而言，南興是理解世界的起點，也是最自然的生活尺度。山、海、族人與家屋，構成了他全部的童年。成年後，他離開部落投入軍旅。「為了生活，不得不出去。」那個年代的現實推著年輕人往外走——沒有工作、沒有產業，中生代只能外流。但即便身在他方，他始終把家鄉放在心裡最深的位置。「不管怎麼樣，逢年過節一定回來。」他說。這句平常話，其實是最清晰的歸屬線索，也說

明了：離開的是身體，沒有離開的是地方。

他看見部落人口一年比一年少，家家戶戶只剩老人。他感嘆，外流的原因不是人心不在，而是「沒有經濟的支撐，誰回得來？」他希望能用多年在外累積的經驗，在部落試著創造新的可能，讓下一代不必再走相同的路。對許多旅外青年而言，大武的「歸屬」有一種深層的形態——並不是返鄉那一天才開始，而是在離鄉的每一天，都清楚知道自己終究會回來。



圖 | 訪談 高德昆先生

第5章 | 願的未來

返鄉、教育與未來想像

願，是大武往前走的力量。青年返鄉、教育扎根與地方行動，逐漸帶來新的願景。大武的未來正在被重新想像，在傳承與創新之間長出新的可能。



5-1 | 地方歷史知識承接：大武記憶的傳遞

葉少雲的生命軸線，幾乎就是大武南迴山線的另一種歷史記憶。她從小在多語、多族群的家庭中長大，父親來自江西廣豐，母親則是「拉勒布勒曼」獵人家族的公主後代。在外多年後返鄉，她決定把過去部落長輩講述的歷史、族譜、山路與事件一一整理、講清楚，因為「再不說，就沒有人知道了」。從浸水營古道到南蕃事件，從加羅板的遷徙路線到五虎溝的祖靈傳說，葉少雲用她的方式承接「在地歷史的記憶工作」。她不是研究者，也不是官方史料整理者，而是把「老人家的話」翻出來、走過一遍、說給下一代聽。她的口述，不只是個人的記憶，而是大武在地知識最珍貴的延續。透過敘述被保存下來。是一代人的經驗，也是大武理解自身歷史的重要線索。她讓地方的記憶得以被聽見、被記住、被傳承。

葉少雲說著自己，父親是江西廣豐縣人，母親來自大武「La Dibruwan（拉的布魯萬）排灣族傳承已久的族群自稱」的獵人家族，因此她從小在語言交錯的環境裡長大。她笑說：「我自我介紹都說，我是「白灣加吉里的鳳仔雞」她笑著。台語、國語、排灣語，她都會一點，講得好不好不是重點，重點是那是她生活的方式。多年在外地生活三十多年，她說「我一直很想回來，只是沒有理由。等到那個理由到了，我就回來了。」她把這句話當作生命的轉折，也當作日後投入地方的起點。

回到大武後，葉少雲開始「把老人家講過的故事重新走一遍」。她說，很多歷史如果不講、如果不查，就會被時間覆蓋掉。例如她提到的浸水營古道，清朝時期為「撫番」所開，後來日本人沿用，「其實這條路比大家想像的更老」。她反覆比對文獻，也親自問部落老人，甚至自己走過路線，只因為「要確定講的是對的」。她提起加羅板的遷徙、孤仔崙社的來源、以及通往大安山的路線，像一張在地族譜與山路的混合地圖，把看似破碎的地方記憶重新串成一條線。

在她的口述裡，最常出現的，是那些別人不太講、甚至不知道的歷史段落。其中最重要的是「南蕃事件」。她說，朝庸溪（中仔溪）上游曾是戰場，是因為「一通打錯的電話」，使得日本政府試圖收繳原住民的獵槍，引發部落反抗。葉少雲說這段時總是語氣平穩，但內容卻沉重：「那不是反叛，那是獵人的工具。」她透過老人家記憶，比對資料，確定事件發生的位置與過程，「這些不講，就不會有人知道了。」在她的語氣裡，那不是責任，而是某種傳承的位置。

她也談到五虎溝與祖靈地的故事。她說，那時候挖隧道，水怎麼止都止不住，「我們頭目包顏華就說，一定是挖到不該挖的。」她不是迷信，而是引用地方的邏輯。祖靈地需要祈福，需要拔力系（palisi/排灣族文化中，遇到重大事件或疾病時的祈求平安），需要豬，需要儀式。她記得很清楚，那是族群與土地溝通的方式。「這些事情，要講給後代聽，不然沒人知道那些地方為什麼重要。」她如此說。



5-2 | 教育 × 在地 × 未來的可能

葉少雲長期投入在地教育，是大武最具連結性的「知識搬運者」。他相信：教育不是把孩子帶離家鄉，而是讓他們長出看世界的的能力，再決定要不要回來。他在教室上課、在老街講故事、在山林裡做實地教學，也在社區裡陪孩子完成每一份探究報告。教育對他來說，是「讓地方重新被理解」的方法。孩子從土地、語言、族群、歷史中看見自己的根；大人從孩子的作品中重新理解大武。葉少雲說：「我們不只是教下一代，我們也在把家鄉教回給自己。」

對葉少雲而言，教育不是課本，而是土地本身。她返鄉後最深的焦慮，不是孩子的學科成績，而是「年輕一代對自己腳下的土地越來越陌生」。她希望孩子知道祖靈地在哪裡、冷泉從哪裡流出、拉的布魯萬的獵人怎麼走山路、地名為什麼叫這樣，以及以前的人怎麼活、怎麼走、怎麼跟土地說話。她更希望讓「部落的故事」重新變成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節慶時才會拿出來的文化符號。她相信，唯有讓孩子真正理解自己的地方，未來才会有留下來、回來，甚至重新創造可能性的力量。教育對她而言，不是制度，而是部落延續的路。

她語氣平靜，但內容很急迫：「如果我們不講，他們就真的都不知道了。」這句話，她在受訪時說了好幾次。

未來不是「返鄉青年回來後會做什麼」，而是「如果這一代什麼都不知道，那下一代還會存在嗎？」她不把文化當作節日表演，也不把歷史當成學術研究，而是當成延續部落生命的方式。她希望孩子可以同時學國語、台語、排灣語，也能知道冷泉在哪裡、部落往哪裡

也正因如此，葉少雲更能看見教育對地方的力量。在人口外流、族群文化斷層、青年越走越遠的現實下，他仍堅信教育是最長、最穩定的耕作。「我們不是要孩子一定要留下來，而是希望他們有一天走得再遠，也知道自己從哪裡來。」這句話，是他多年在地耕耘後最深刻的體悟。

在與孩子們的相處中，他看見每一代人的不同。過去的孩子熟悉潮間帶，如今的孩子可能連海邊的風向也說不上來；過去族語是生活，如今族語變成課程。正因如此，他更努力把學習帶回生活。只要能把孩子帶回土地、帶回故事、帶

回家庭語言的一角，他便相信文化的線就不會斷。

葉少雲的工作，不是宏大的計畫，也不是立刻看得見的成果，而是一種慢慢發酵的力量。他陪著孩子一起長大，也陪著大武在變遷中維持自己獨特的步伐。他說：「教育最美的瞬間，就是看到孩子因為某件小事而改變。」那讓他相信，大武的未來，不靠一座建築物或一項計畫，而是靠每一個願意學習、願意回望土地的人。

在葉少雲眼中，孩子，是大武未來的地圖；而教育，就是讓地圖長出方向的種子。



圖 | 訪談葉少雲女士

特別篇 | 海上遷徙

大陳人 × 大武

從海上漂泊到大武落腳，大陳人的語言、信仰與生活節奏在海岸線蔓延，與在地文化相互映照。



大陳人 × 大武：海上的遷徙與落腳

大陳撤退未曾出現在莊春梅童年視線，卻在披星新村成長歲月中形塑濃厚文化底蘊。聽著大陳耆老蔣叔叔述說著當年的 1955，伴隨濃霧、炮響、匆促登船的人影；媽祖娘娘首肯擲筊，願香火跨海護佑，傳說撤退當天晚上天雷四轟，雷引天火頃刻焚毀天后宮；金剛計畫軍事遷移交織出新聚落雛形。她童年記得三寸金蓮阿婆、曬魚乾鹹香、巷弄間語言交錯跳動，使小聚落彷彿縮影世界。陳宗欽回望大武，認為大陳人到來為地方添上一層活力；多年後，徐慶東從社會變遷視角理解這段跨海遷徙不只是一場漂流，而是一股讓土地重新長成文化枝脈的力量。

莊春梅說到，大陳人登陸台灣、落腳大武的故事都比她早了十幾年，但因為住在披星新村附近，從小聽長輩、鄰居、街坊的大陳阿公阿嬤說故事，那些「不是親眼看到，卻像陪著她長大」的記憶，慢慢成為她對大武的理解。

她說，很多事情她都會說「是耆老講的」，因為這些故事並不是她的年代，而是她生活在街坊巷弄之間聽來的。披星新村對她的童年來說，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；她記得長輩說，當年政府安排大陳人落腳時，村子一開始的房舍簡陋，都是急建的木造、板模房，有些人用軍方補助、有些靠自己動手搭建，大家從陌生的浙江沿海來

到台東海岸，語言、氣候、飲食全不一樣，但日子是一步一步撐起來的。她說：「我出生時，新村已經比較穩了，但聽老人家講以前，是更苦、更亂、更靠彼此的年代。」金剛計畫也是她從耆老口中聽來的。她回憶，大陳長輩常說，那時政府推動改建與遷村，有些家庭搬到新的住處，有些選擇留下。那段時間新村裡常看到人在搬磚、補牆、整理屋頂，像整個村子都在重生。她說，小時候走過披星新村，常常看到長輩坐在門口講「金剛計畫前後差別很大」，有人說房子更堅固了，有人說生活終於像「有根的家」，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「家可以因為計畫而被重新形塑」。



圖 | 訪談 莊春梅



有位大陳耆老蔣叔叔曾對她說：「妳這個人，我帶得回大陳島去。」這句話不是稱讚，而是一種認可。她也因此始終堅持天后宮的名稱一定要保留「大陳」。她說：「這是他們的名字，不能沒有。」

莊春梅並不是只記錄大陳人的遷徙，她也觀察到大武的文化融合。尚武、南興、大武老街與大陳新村，各自有語言、生活方式、宗教信仰，但在日常裡卻自然地相互交錯。大陳人走在部落會講台語、閩南人跟大陳人做生意會學幾句大陳話，排灣族長輩過年過節會到天后宮拜拜，而大陳子弟也習慣在收假前去部落冷泉取水。她說：「大武就是這樣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可是又都黏在一起。」她看著大陳人落腳、扎根，看過他們的苦的日子，也看到他們的韌性。她用口述的方式，把大陳的記憶重新說給大武聽。對她來說，大武不只是族群融合的地方，更是在人生的故事裡互相寄放、共享記憶。

這些故事有一天可能會消失。她知道許多耆老已經過世，許多細節如果現在不記，未來就永遠沒機會再問。她在社區、在廟埕、在活動場合講大陳人的故事，講他們怎麼從海島來、怎麼在山邊生活、怎麼把大陳天后宮重建起來。那不是她的家族史，但她用自己的方式，守著大陳與大武的歷史故事。

「被大武海風吹散的記憶逐漸遠去，留下的只是一句提醒
——文化還在，但故事正在消失。」

製作緣起

這本書的誕生，源自一次偶然的老街田調。多年前，我和學弟-李政倉還在製作《大武鄉社區報》時，曾在大武老街遇見一位長者。他看著我們手上的老照片，再比對眼前的街景，便從那張影像開始講述童年的大武老街。說著說著，他帶著我們走進街上，一段段趣事也隨著腳步被喚醒。更有趣的是，沿路的長者也加入討論，大家一邊笑、一邊回憶，就這樣在老街上度過了一段意外卻珍貴的時光。

起初，就只有我們兩位旅外青年。政倉比我更早返鄉，接手自家事業；我則在民國 114 年 2 月回到大武。當時我們一起編寫老照片專欄，沿著影像與耆老的

記憶，一步步追尋老街的故事。那段採訪過程像是一扇時光門。尤其是拍攝〈大武福安宮——百年神尊李王爺〉時，長者說故事的神情、語氣與手勢，彷彿帶著我們走進早年的大武。

然而，那天在老街上長者們的笑聲，如今回望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。這些年來，我們深刻感受到：大武人的故事散落在村里各處，藏在廟口的閒談、潮間帶的浪花、山海之間的遷徙足跡裡，卻始終缺乏完整的紀錄。在耆老的口述中，我們聽見的不只是事件，而是生命的厚度與文化的脈絡。於是，一個念頭悄悄萌生——「若能讓大武人自己話大武事，該有多好？」

隨著訪談逐漸展開，我們拜訪了許多大武鄉的耆老。整理三十多篇逐字稿的過程，就像挖掘寶藏——每個停頓、每聲笑語，都埋藏著族群融合、產業興衰與家庭堅韌的線索。政倉整理老照片，我處理訪談文本，兩條故事線逐漸交織成一本完整的大武文化誌。

過程中當然也遇到挑戰：排灣語的轉譯、模糊的記憶、不同年代敘述的錯位……但正因如此，我們更珍惜每一次對談。這些經驗提醒我們：大武不是靜止的地名，而是一個被生活不斷書寫的場域。後來，更多返鄉青年與在地行動者加入了行列，從陪伴耆老到參與地方活動，讓本書不僅回顧過去，更成為一場跨世代的對話。

「若能讓大武人自己話大武事」——這句話，也成為我們進入下一階段的起點。

如果能把不同世代的記憶與影像，透過口述的方式重新帶回當年的老街，讓長者、青年與孩子的視角彼此重疊，那些記憶便能像圖層般堆疊，拼湊出一幅屬於大武的百年記憶地圖。未來，我們也期待導入AI與數位技術，重現不同時光的大武老街景象。透過老照片、地圖、生活軌跡與口述內容的重建，讓過去不只是被聽見，而能被看見、被走進、被重新理解。這不只是保存，更可能開啟大武文化史的嶄新篇章。

書 名 | 大武人話大武事
副 標 題 | 大武的百年記憶地圖
作 者 / 撰 稿 | 林昆緯、李政倉
主 編 / 編 輯 | 林昆緯、蔡劉可柔
攝 影 | 羽震多媒體、方宣喻、吳善米
出 版 者 | 大武鄉公所
地 址 | 965 臺東縣大武鄉政通三街 5 號
電 話 | 089-791340
出 版 日 期 |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
版 次 | 第一版
裝 訂 | 膠裝 (Perfect Binding)

版權所有・非經同意不得轉載

© 114 大武鄉公所著作權所有

